第43卷 第3期
2006年5月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43, No.3
May 2006

蒲松龄辞赋考论

王茂福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温州 325035)

摘 要：蒲松龄的辞赋作品共有25篇；其内容有铺写名胜古迹，抒写身世之感，刺世讽世劝世，单纯咏物，描写灾荒，描写日常生活情态六类，部分作品足以与赋史上最有名的篇章比肩；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题材、主题的开拓与创新，风格的多样性，具有明显的情节性、故事性因素，体式、语言的灵活运用四个方面；蒲松龄足以占据二流赋家的地位。

关键词：蒲松龄；辞赋；内容类型；艺术成就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6)03-0072-07

蒲松龄不仅是短篇小说之王，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辞赋家，但人们对此了解甚少，也未见学者有专门论说[①]。兹不揣谫陋，试为论之。

一

蒲氏辞赋，路大荒《蒲松龄集·聊斋文集》卷一"赋"类收录11篇：《秦松赋》、《古历亭赋》、《趵突泉赋》、《煎饼赋并序》、《祷雨赋》、《荷珠赋》、《绰然堂会食赋并序》、《伤寒药性赋》、《酒人赋》、《屋漏赋》、《蝗赋》[②]。盛伟《蒲松龄全集》单列《聊斋赋集》，收录10篇，其中删去路氏本《屋漏赋》、《蝗赋》2篇，增补《中秋爱静赋》1篇。盛氏删去2篇之理由，在其《编订后记》中称，系由"见于唐梦赉的《志壑堂集》，非蒲氏所作"[1](P2041)。本来，仅据一人作品同时见于另一人集中之材料，并不足以断定作品之归属，然山东大学袁世硕先生《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蒲松龄与唐梦赉》对此曾作详考，判定收入《志壑堂文集》之二赋系唐梦赉所作，可为确据。故目前仅据以上材料可认定的蒲氏赋作当为10篇。

另外，路氏《聊斋文集》卷九"祭文"类所收《祭蚩虫文》、卷十"杂文"类所收《责白髭文》、《戒应酬文》，就其体式、押韵、写法来看，均属典型赋体，应归入辞赋类。卷十所收《为花神讨封姨檄》、《群卉揭乳香札子》，其文以铺写事物特征为全部内容，其辞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符合赋体"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之特征；作品完全脱去实用色彩，纯以审美为目的，具明显的"游戏"态度，且辞采飞扬，符合"诗赋欲丽"的要求；唯押韵不尽合典型赋体，但也并非无韵，只不过换韵较多且不能涵盖全篇。依学界目前对辞赋的归类标准，此2篇亦可归入辞赋类。卷十所收之《祝词文》、《〈妙音经〉续言》、《〈怕婆经〉疏》3篇[③]，除内容有别于上述2篇外，其余特征均与之相类，故亦可归入辞赋类。

同时，路氏《蒲松龄集·附录》所收《除日祭穷神文》、《穷神答文》，是两篇典型的俗赋。其《编订后记》言《附录》所收作品时说："还有一些流传的抄本，据说也是蒲氏的著作，但也还很难断定。"[2](P1753)现已过去四十多年，对这两篇作品的作者并无任何异说出现；二作内容与蒲氏身世相合，风格与蒲氏其他通俗作品相合；另据杨海儒《蒲松龄遗文〈塾师四苦〉〈训蒙诀〉〈卷堂文〉》[④]一文介

收稿日期：2005-12-02
作者简介：王茂福(1950—)，宁夏中宁县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① 参阅《蒲松龄研究》1996.3—1999.4之《蒲松龄研究论文索引》。
② 见路大荒《蒲松龄集》第21—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③ 路大荒《蒲松龄集》第282—283页，第295—301页，第308—311页。
④ 见《文献》1988年第4期，第59—63页。

绍，蒲松龄纪念馆藏晚清“璞斋钞”“聊斋词曲”旧抄本亦收有此二文，并可推断路氏当年未见此抄本。据以上三点，笔者以为可将此二文认定为蒲氏所作。

还有，盛伟《蒲松龄全集·聊斋文集》卷九“杂文”类所收《赌博辞》，除押韵不尽合典型赋体外，其余性质全同于赋集中之《酒人赋》，故亦可归入辞赋类。盛伟《聊斋佚文辑注》（齐鲁书社）所录之《警士录》、《文献》杂志1987年第1期刊布之聊斋遗文《教书词》、《先生论》、《讨青蝇文》等4篇作品，都是典型的赋体文，亦当归入辞赋类。

依以上爬梳，可认定蒲氏辞赋作品25篇，数量相当可观。

二

蒲氏辞赋，就其体制而言，全部是小赋；就其基本体裁而言，约有十篇是咏物之作，五篇是讽刺之作，其余是抒情言志之作，但无论何种体裁，均以抒情为其主导倾向。就内容而言，蒲氏辞赋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铺写名胜古迹之作。其基本内容有二：一是围绕名胜古迹描摹环境景物，二是就相关之历史、人事抒写感慨，在咏物（咏史）、写景之中附以寄托。所寄托之内容则大体为两个方面，一为对某种人格节操的颂扬，二为对人文兴衰的感叹和对人生的希冀。《秦松赋》据袁世硕先生推考[①]，约作于康熙十二年。作品赋泰山名胜“五大夫松”以托物寄志。《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于二十八年登泰山封禅，及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此赋多方描摹了古松的诸种情态；但重点表现其在艳春花木争媚时“岑寂邱阿”、“不以美炫”，在寒秋万芳摧折时“清标独耸”、“无喜无悲”，在人事代谢、河山屡易的历史兴衰中“存昂藏之瘦骨，亘古今而不坠”的风格；特别是颂扬古松义不帝秦、羞为其臣的孤高独立之节操和不辩俗议之超然态度。尽管作者赋予古松的风格乃素已有之，但身近烈士、不为秦臣的操守毕竟翻出新意，且全赋立意高古，风格苍媚劲健，颇有风骨，实为杰作。古来咏松之赋不少，其中也有唐王勃《涧底寒松赋》、李绅《寒松赋》等优秀之作，但与《历代赋汇》中赋松柏之作相比，《秦松赋》无疑是最杰出的一篇。《趵突泉赋》约作于康熙二十三年。是年康熙首次南巡，十月至济南，幸趵突泉，有题咏。（见《东华录》卷十三）作者赴济南应山东乡试，也许正逢其典，故作此赋。赋中首写景，次颂圣，终寄怀，立意并无特出之处，但对趵突泉的描写却丰富多变，颇有气势。其后称羡该泉得邀圣宠之隆遇，并借题发挥，寄寓科场蹉跌之无奈与歆羡希冀之情，应该说还是生发巧妙的。是时作者45岁，应乡试已逾20载，将人生际遇之感寄于得遇殊宠之泉，当也是慨叹深切，不为无病呻吟。《古历亭赋》写济南大明湖上古迹古历亭。康熙三十二年，山东盐政李兴祖重修古历亭，嗣后颇有一些文人的雅集唱和之举，被视为历下的文坛盛事，山东布政使喻成龙和李兴祖并选编有《历亭诗文会编》。是年蒲氏曾被喻成龙邀至官署会面，也许参加过类似聚会。路大荒《聊斋诗集》录有《重建古历亭》诗，隶于癸酉年（即康熙三十二年），题下注：“李兴祖《蔚蓝记略》：‘癸酉夏，葺古历亭竣工。’”诗后注：“右诗自喻成龙、李兴祖所选《历亭诗文会编》第四卷录出。”《聊斋诗集》还录有《古历亭》诗一首，隶于甲戌年（即康熙三十三年）[②]。《古历亭赋》即以历亭重修文事为背景，所以亦应作于此二年之间。此赋立意着眼于历亭自唐以来人文事业的历次盛衰，寄寓的是对文事兴盛的赞颂和渴望，也是很有意义的；且述兴旺则颇有繁华之概，叙衰落则颇有苍凉之气，起伏顿挫，回转自如，虽不能称为杰作，亦足以位列优秀。

第二类是抒写身世之感的作品。此类比重最大，有7篇之多。内容集中于对沉沦底层、处境困窘的悲慨与不平。依其侧重点的差异，可分为三个子类：第一个子类是科场蹭蹬的悲歌。《责白髭文》作于康熙二十六年48岁时。是年作者应乡试因越幅被黜，有感于白髭屡生，“揽镜怆然，弥增感愤，因为文以责之（白髭）”。其文故设为作者与髭神的辩难互责，实在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奇文，沉痛

① 参阅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第130—131页，齐鲁书社1988年版。

② 路大荒《蒲松龄集》，第553—554页。

悲愤,幽默诙谐,笑中含泪,像《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篇章一样,浸透了多少科场落败士子的失意与辛酸。若推原始,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当为此赋远源,但区别已巨,前以说理为宗,后则纯为抒情。西晋左思有《白发赋》,张敏有《头责子羽文》,均为赋史名篇,蒲文在立意、布局上有相类之处,但要稍胜一筹。愚以为此文在赋史上应不屈居二流,可与东方朔《答客难》比肩为二。第二个子类是对困窘生活处境的愤懑。《除日祭穷神文》、《穷神答文》是一组俗赋。前篇指责穷神,其沉痛幽默类于《责白髭文》而有逊;后篇则以讽世骂世为主,失之于散漫。此二文渊源于扬雄《逐贫赋》、韩愈《送穷文》,与之相比,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但内容的丰富深厚均远不及。《戒应酬文》重点是抒写"人皆鼎烹,尔独藿藜;人且重裘,尔无絮衣;彷徨永夜,亦孔之凄"的艰难处境,立意、构思有类《责白髭文》,但情韵有所不及。《讨青蝇文》则是一篇风格独特之作,堪称优秀。其文以愤激的情绪命令青蝇"飞过乎墙南",到豪门去寻求享乐,倘若还在此"久恋一穷酸",则要"问罪兴师","扑之成泥"。此文有韩愈《祭鳄鱼文》之余意,然以诙谐之笔出之,令人忍俊不禁。《历代赋汇》录有咏蝇赋4篇,晋傅咸之作已残,宋欧阳修、孔武仲之作太过散漫,唯明骆文盛之《怜寒蝇赋》曲折多姿、逸趣横生,是优秀之作。《讨青蝇文》足以与骆作比肩。《明文海》还收有咏蝇赋4篇,均远不及蒲氏之作。第三个子类是对坐馆生涯的慨叹,《教书词》、《先生论》属此,均为俗赋。前者短而率意,可不论。后者较好,历数了西席的诸般苦况窘境,最后表示要蟾宫折桂,跳出苦海,立意不高,属一般之作。从文中内容和语气推测,此二文可能作于坐馆早期,思想、文风均不成熟。

第三类是刺世讽世劝世之作。《祝词文》是蒲氏辞赋中唯一抨击贪官的作品,其背景不详,笔者考诸相关文献,约略言之:康熙四十八年,淄川漕粮经承康利贞勾结知县俞文翰,大幅度增派漕粮米价及杂费,引起合县舆论沸腾。作者时年70,屡次上呈县衙不果后,亲往济南上呈布政司。翌年俞文翰去职,四月,布政司行文革除康利贞。但康又厚赂新城罢官居家的刑部尚书王渔洋、同邑进士谭再生为之关说,复为淄川漕粮经承,合县皆惊。作者愤而致书王渔洋、谭再生,要求约束康利贞;并上呈新任县令吴堂,要求对康"剪恶除根,永行褫革"。从文中内容看,《祝词文》当作于此背景下之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其文内容一是叙述贪官蠹役为害之烈,其辞有似于《席方平》中二郎神的判词;二是祈祝苍天冥宰"永布阳春","下烛民艰"。此文虽不特出,但情绪愤激,情真意切,这在批判性并不强的辞赋中,还是很难得的。《酒人赋》、《赌博辞》是讽刺酒鬼、赌徒之作,重点在描摹刻画其人沉湎其中的诸种丑态及其危害。古来写饮博之赋甚多,但大都着眼于其"物"之特征之描摹,并及方法、情趣等,间有批评,亦不强烈,主要表现的是中上层文人的雅趣情怀。蒲氏之作以"人"的行为刻画为主旨,给予强烈尖刻的讽刺,体现着明显的下层社会的关怀重点。《赌博辞》稍嫌拘滞,说教色彩较明显。《酒人赋》则挥洒自如,描摹到位,讥讽之处,令人喷饭。窃以为咏酒之赋,若论寄托,当以扬雄《酒箴》为上;若论讽刺,则当以此作为优。《〈妙音经〉续言》《〈怕婆经〉疏》是两篇讽刺悍妇(兼及懦夫),表达作者独特的讽世劝世之心的作品。二者内容相同,但后者不及前者,故此只论前者。蒲松龄是中国文学史上写悍妇最突出的作家,此文与《聊斋志异》描写悍妇的篇章相映成趣,虽其抨击女子悍妒的思想倾向已不为今世所许,但无论就内容还是就形式而言,它都称得上是赋史上的一篇奇文。它以雅写俗、寄俗于雅的写法,驾驭骈体、遣词造句、圆熟用典的功夫均属一流,《历代赋汇》录有梁张缵、明陈子龙两篇《妒妇赋》,均远在其下。《警士录》则是一篇警诫士子"与其悔之场屋,何如奋之书堂"的劝世之文,字句流畅而内容一般,估计是早期之作。

第四类是单纯咏物之作。《为花神讨封姨檄》、《群卉揭乳香札子》是两篇咏花木的作品,乃纯粹的"游戏"之作。前篇作于康熙二十二年,出自《聊斋志异·绛妃》篇,是为花神讨伐风神所作的檄文。其文历数封姨"飞扬成性、忌嫉为心"的诸多罪恶和万花饱受蹂躏、悉遭摧残的无奈惨状,号召众芳同仇敌忾,"群兴草木之兵",与封姨决一死战。尽管此文出于戏笔,但颇有豪壮之势、悲愤之意与杀伐之气,其文势之流转,文辞之圆熟,句式之谐畅,语汇之丰富,均属一流,极富辞赋之典雅,

又毫无板滞之病。若单就文辞本身而言,此文绝不在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之下。后篇写丹、药、兰、菊等群卉上书"东皇殿下",控诉乳香独占阳光雨露、致使群卉憔悴枯萎的肆虐,立意、写法均与前篇相似,但逊于前篇。依此推测,它应与前篇作于同一时期而早。《伤寒药性赋》是一篇实用之作,写各味中药的医疗功能,尽管写来颇难,但失却了文学意味。《荷珠赋》系咏物写景之作,它取咏物小赋之常式,采用最通行的写法,多角度描摹荷珠的诸种特征和情态,写得中规中矩、穷形尽相。《历代赋汇》所录唐白居易《荷珠赋》、无名氏《清露点荷珠赋》,是唐代律赋中为数不多的有名作品,此赋与之差可比肩,但不足以显示蒲氏的创造性。

第五类是描写灾荒之作。《祷雨赋》系年不详,文中只言作于六月。依盛伟《蒲松龄年谱》提供的材料,明确记有淄川六月遭旱的年份有六次,而有蒲氏其他诗文作映证的有两次。其中康熙四十七年一次,但从蒲氏相关诗作看,整个六月及其后均无雨,与赋中所言情况不合。四十三年一次,久旱后于六月初八得雨,而此年作者记灾的诗文最多,故此赋最有可能作于本年。赋中首叙旱象,次言旱祸,后状求雨过程,尤以降雨的描摹最为精彩有致,且饱含感情,虽事涉荒诞,却是动人之作。《祭蜚虫文》作于康熙四十二年,是年淄川等地发生蜚灾,损失惨重,故作者应乡民之请为文以祭之。作品先述蜚虫的特征及为害之烈,继则谴责蜚神并致祭以遣送之。此文立意本于韩愈《祭鳄鱼文》,但文体、风格均不同。韩作用散体古文,以说理命令为主,以气势胜;此文全用赋体,以描述劝诫为主,以情致胜,差可比肩于韩作。

第六类是描写日常生活情态之作。此类作品以乡间的日常生活情景为描写对象,充满了浓厚的民间特征、生活气息和幽默色彩,清新活泼,极富情趣,是以往辞赋中所没有的。《煎饼赋》写山东地方食品煎饼的各种形制和食用方法,尤其是写煎饼在荒岁中的救灾之功,出以调侃幽默之笔,令人粲然。《绰然堂会食赋》,据其小序所言推断,当作于康熙十八年作者初到西铺毕家坐馆之时。作品描绘一群孩子争食的诸种情态,绘形绘色,活灵活现,传统赋的板滞之气荡然无存,是一幅极为生动的生活图画。

另有《中秋爱静赋》一篇,抒写作者的情怀兴致,较为一般。

三

时至宋代,赋在体制上的创新发展之路已经走完,故宋代以后优秀的辞赋作品,都继承着前代的某种体制,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对内容、题材、主题、风格等方面的某种开拓上;或者虽然在上述方面没有什么开拓,但在艺术上却写得非常成功、精巧,这都体现了对辞赋发展的贡献。蒲松龄的辞赋创作当然也在这个总体框架之中,具体而言,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题材、主题的开拓与创新。从上文叙述可看出,蒲氏辞赋所涉及的题材面很宽,且创新性很强。这种创新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开拓出了一些前人未曾表现的题材领域。缺乏批判性曾是汉赋遭人诟病的重要原因,自赵壹《刺世疾邪赋》始,在不同时期出现过一些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但其内容大都集中在对政治弊端、统治集团内部倾轧、坏人当道阻塞贤路以及不良世风等的批判上,像蒲氏《祝词文》这样直接抨击贪官之作,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尚未曾见。赋史上写鳞虫之作极多,蝉、蛙、蜂以至蟋蟀、蚯蚓、苍蝇、蚊子、虱子等都有不少作品去写,但奇怪的是在《历代赋汇》中却没有写造成农业天灾的害虫(如蝗虫)的作品,蒲氏《祭蜚虫文》是笔者见过的写农业害虫的3篇辞赋之一。赋史上写草木花果之作数不胜数,但像蒲氏那样写花神同风神斗争,花草同乳香矛盾一类的作品却属仅见。再如《绰然堂会食赋》这样描摹生活场景,《煎饼赋》这样写民间食品之作,虽无重大意义,却也为赋史增添了之前未有的极富情趣的作品。即使是《伤寒药性赋》这样并不成功的作品,也是赋史上从未有过的。第二个方面是在前人写过的一些题材上,努力另辟蹊径,拓展出新的主题、角度。上段所列写名胜古迹一类以及《责白髭文》、《讨青蝇文》、《酒人赋》、《赌博辞》等作,均属这种情况,因前文已略有所及,此不赘言,仅举《〈妙音经〉续言》一例。《历代赋汇》中梁张缵《妒妇赋》已残,文中仅对妒妇单方面的一些表现作了简单而平面化的罗列;

明陈子龙《妒妇赋》全仿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之体式以作讽谏,因袭色彩显眼之极,其中描写妒妇的一段写法与张作完全相同。蒲作则从男女双方着眼,重点对悍妇的行为、特点作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描摹,并挖掘了造成女子悍妒的根源,还提出了所谓疗救悍妒的方法。此文恐怕是反映古人对"悍妒"这一现象的态度、认识最全面的作品。第三方面是在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下层化、民间化特点。辞赋的作者本来基本上都是中上层文人,所反映的自然基本上是中上层社会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包括咏物之作也是如此。蒲氏一生身处下层民间社会的身世经历造就了他大部分辞赋作品的下层化、民间化特点。"士不遇"是辞赋中作品量庞大的一类题材,自董仲舒、东方朔、司马迁始,代不绝书,但基本上都是有才能的中下层官员对"英俊沉下僚"、"有志不获逞"的感叹,总体上不出官僚阶层。蒲氏感叹身世的辞赋表现的是沉沦底层的穷秀才的命运之感,远比前类沉痛、悲愤、绝望得多,其中写坐馆生涯的作品的下层化特点则尤为明显。正统文学中抨击贪官、描写天灾的作品,也基本上是关心民瘼的官员、文人"愤世刺贪"、"伤时悯农"的产物,是居高临下的同情与关怀,对它们的最好评价是"感同身受"。而蒲氏的此类辞赋则表现的是要上粮当差的小民身受刻剥、断其生路的剜肉割肤之痛,自然要真切、强烈得多。写送穷神、写饮博、写生活情态之作的民间化特点前文已有所及。写悍妇的作品其民间化特点也是很明显的,它是礼教统治薄弱的乡村民间社会中一种生活状态的反映。总之,在蒲松龄手中,高高在上的辞赋纡尊降贵地到下层、到民间巡视了一番。

第二是风格的多样性。首先,辞赋的三大类型作品在蒲氏之作中齐备。第一类是典丽之作,前文所列写名胜古迹、单纯咏物、写悍妇之作以及《祷雨赋》、《祝词文》、《中秋爱静赋》大体可归入此类。此类作品采用小赋的传统写法,多方铺陈的特点突出,句式工稳,尤其在语言上,或典雅或华丽,语势铺张而有度,有的篇章则大量用典使事,充分体现着辞赋典雅华丽、文采斐然的主流特点,大都写得圆熟老道,直逼古人,在继承中凸显着逼人的才气和功力。第二类是通俗之作,除第三类所列的数篇之外,其余均可列入此类,主要是写饮博、生活情态、身世之感的一些作品和《祭蜚虫文》等。此类作品在取材立意上即往往斜径旁出,句式灵活,最突出的是语言通俗流畅,很少用典,有的甚至通篇不用一典。这些作品大都写得洒脱活泼、情趣横生,最能体现蒲氏辞赋的创造力。第三类是俗赋。赋史上通俗之作与俗赋的界限并不容易划清,笔者在此参照蒲氏俚曲的特点,将以白话为主的作品归入此类,它计有《除日祭穷神文》、《穷神答文》、《教书词》、《先生论》4 篇。其中前两篇语言极流畅,从中可窥见作者驾驭白话的超凡功力,但除第一篇较优秀外,总体成就不高。作者这方面的才能主要用在了俚曲上。三大类型均各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充分表明蒲氏驾驭各类赋体的能力。其次,蒲氏辞赋具有多种艺术风格,大体可分为庄重、讽刺、幽默三种类型,每种风格都表现得非常成功。其中庄重风格的作品比重最大,尤其是写名胜古迹之作以及《祝词文》、《祷雨赋》、《祭蜚虫文》,甚至连《为花神讨封姨檄》、《群卉揭乳香札子》这样的作品,都立意庄严正大,行文庄重端雅,典型地走着辞赋的主流风格路子。讽刺风格的作品则集中在写悍妇和饮博之作上,其基本方法是往往用夸张性的言词,并巧用典故,来极力描摹对象的各种行为举止,突出其可笑可恨之处,写得穷形尽相、酣畅淋漓,铺张而不累赘,尖刻而不浅陋。幽默风格的作品数量居第二,绝大多数都写得很好,而且各具特色。有的幽默中含着沉痛,如《责白髭文》、《除日送穷神文》;有的幽默中含着愤激,如《讨青蝇文》;有的幽默中含着轻松,如《绰然堂会食赋》;有的幽默中含着调侃,如《煎饼赋》。这几种风格可以说涵盖了赋史上基本的风格类型。

第三是具有明显的情节性、故事性因素。由于蒲松龄是小说家,所以小说的成分就很自然地浸入了其辞赋创作之中,这也许是蒲氏辞赋最显著的特征。为更条理化和方便叙述起见,现归纳为三种情况:一是设置片断化乃至全局化的情节。这通常表现为假托人物,形成对话。这种方式本来是赋最正宗、最常见的结构方式,但在传统赋中,假托人物只是用来作叙述事物、发表议论的工具,除少数变体作品外,并不构成任何真正的情节

成分。可在蒲氏赋中，却把它当作小说化的细节乃至情节来使用，有事件片断的演进，有人物的动作、神态以至心理，完全成为了故事化的成分。如《秦松赋》末尾，写作者“登岱”过秦松下，向其“摩挲”而发问；之后“徘徊良久，坐而假寐”；接着“梦一伟男”回答了他先前的提问；最后“山风谡谡，予忽警悟；拱立竦息，拜揖而去”。这岂不是小说化的细节处置？《煎饼赋》在后半段设置了“野老”同“锦衣公子”为交换煎饼而讨价还价的生动而有趣的细节，也是小说手段。《戒应酬文》也有这种极富戏剧性的细节。以上是片断化的情节设置，《责白髭文》则是全局化的。其文先写作者愤激地指责白髭，然后“隐几而卧”，便有“素衣丈夫逡巡入梦”，反唇相讥；再有“予”“忿然作色”，发狠说要焚毁笔砚，弃却功名，“又何求于汝哉”！其人“瞠目若怼，但拱手曰：‘凭子！凭子！’”等到“豁然而醒，捻髭而视”，竟然还“数茎挺然，犹含怒意”。全文笼罩在小说化的情节框架之下，中间又包含着丰富而有趣的细节。《为花神讨封姨檄》、《群卉揭乳香箝子》采用拟人化手段，将本是铺陈事物特征的咏物之作写成两阵对垒、讨伐参奏的斗争关系，其实也是全局性的情节化设置，这同《聊斋志异》中的精魅小说走的是完全相同的构思路子。二是灵动的小说化的场面描摹。最典型生动的是《绰然堂会食赋》中的众童争食，完全是小说中的场面，前文已有所及。《祷雨赋》中求雨的场面也很典型，文中充分运用故设曲折、忽擒忽纵的笔法，同《聊斋志异》运筹情节、制造效果的方法是一样的。其他如《酒人赋》写酒鬼喧哗嘈杂、呼天吁地、张牙舞爪、呕吐狼藉的场面，《赌博辞》写赌徒叫号赌场、“废寝忘餐”、“全军尽没、热眼空窥”的场面，也都非常灵动。三是生动的人物动作、神态描写。这已大量地包含在上述两个方面之中，兹复略举数例：如群童争食时探身夹菜，袖沾菜汁；为抢先“赤手搏肉，饼破流汤，唇膏欲滴，喙晕生光”；恐落后“连口直吞，双睛斜瞪”，种种情态栩栩如生。其他如赌徒输光钱后半夜溜回家的神情，悍妇发威施凶和撒泼打滚的模样，均如在目前、可描可画。传统赋以铺陈名物和说理为主，极少有活的人物。蒲氏以有类于小说的笔法描摹人物的动作神情，赋中便有了不少虽简单却鲜明的人物形象。以上三个方面看似平常，但对赋而言却是一种革命性的因素。赋的一大弱点就是板滞之病，逐项铺陈的写法造成结构板滞、文气板滞。蒲氏把小说的写法带进了赋，在其中融入明显的情节性、故事性因素，便打破了这种板滞，使它灵动了起来，大大地增加了赋的生动性。

第四是体式、语言的灵活运用。从体式上看，蒲氏辞赋除俗赋外，全部是骈体赋。稍细致些说，又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大体取汉末魏晋之间的骈体形式，同时又较多地融合着汉代文赋，甚至唐宋新文赋的结构特点。以骈为主、骈散结合，即大部分篇幅是韵文，句式整齐，但不刻意追求对偶；文中时常杂有散句散段以前后联络，并以散文之势统驭全篇；大都或整体或部分包含着对话内容；语言典雅中透着古朴。《秦松赋》、《趵突泉赋》、《煎饼赋》、《责白髭文》、《戒应酬文》等大体如此。这种体式的特点是形式灵活，文气流畅，富于变化而不呆板。第二种的基本体式和特点与上一种大体相同，所不同的是没有上一种的散文、对话成分，因而更为整齐，形式化的特点更为明显但不及下一种。《酒人赋》、《绰然堂会食赋》等一批作品属此类。第三种是取六朝特别是齐梁间的骈体形式，句式整饬，四六言句占统治地位，杂以五七言诗句和少量特殊句式，刻求对偶，大量用典，语言典雅中更现华丽，能充分显示作者驾驭形式化语言的功力。此类作品数量有近十篇，以《古历亭赋》、《祷雨赋》、《为花神讨封姨檄》、《〈妙音经〉续言》最为典型。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蒲氏对以歌作结的形式颇感兴趣，有 5 篇作品都采用了这种形式。蒲松龄俗赋的体式有类于其俚曲，句式长而灵活。

蒲氏辞赋驾驭语言的功力实属一流，限于篇幅，只对其骈体赋的句式和用典略述一二。先说句组：骈赋通常是两句一组，较多的情况又是两组拼成一个双组，到六朝尤其如此。蒲氏赋除常例外，还有多种句组形式：首先是大量使用三句组，经统计共有 41 组，而且除 3 组外，其余 38 组又拼成 19 个双组，仅《〈妙音经〉续言》就用了 7 个双组。前人只偶用三句组，且多为单组，像蒲氏如此用法则极为突出。其次是四句组，在《古历亭赋》和《〈妙音经〉续言》中各有 1 处，共 16 句 4 组而成

双。另外在《趵突泉赋》中还有极罕见的五句组。再说狭义的句式:骈赋的典型句式是四四、六六、四六、六四句式,到六朝又较多地融入了五、七言诗句,其他句式则越近齐梁,种类和数量越少。蒲氏赋的句式种类则极为丰富,经笔者统计,其双句组除四种常规句式外,即有三三、三四、四五、四七、四八、五四、五五、五六、五七、六五、六七、六八、六九、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八、七九、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八、八九、八十、九四、九六、九七、九九、十十共31种句式。(散句和提顿处的关联词、句排除在外)上文所述三句组的41组句子共有20种句式,其中只有两个双组的句式是重复的。四句组、五句组的句式则都是独有的。句式种类最多的篇目是《〈妙音经〉续言》,共有21种非常规句式,其中双句组13种,三句组7种,四句组1种。句组、句式的多样,造成作品节奏的多重错落变化,便从一个方面大大打破了传统赋的板滞夙病,使其文势跌宕起伏,畅达中又显参差。

蒲氏赋的用典主要集中在一部分典丽型的作品中,其特点一是量大,二是圆熟,三是灵活。其用典有的是在畅达疏朗的铺陈中嵌入一二典故,造成疏密有间的效果,如《秦松赋》。有的则是集中而大容量地用典,造成铺陈典故的特征,如《为花神讨封姨檄》、《〈妙音经〉续言》就几乎通篇用典,给人以层出不穷的感觉。集中用典中有的又采用浓缩的方式,如《古历亭赋》在一对句组内,就浓缩了12个典故,可谓密不透风。就用典效果看,真正做到了工整绵密、圆熟自然、回转如意,故用典虽多却毫无生涩勉强之感。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一些讽刺作品中以雅写俗的用法,常常把一些很典雅的典故信手拈来,灵活运用,以诙谐幽默之笔出之,能收到很奇特的讽刺效果。

回顾前代,在赋史上占有一流地位的,大都是在赋的体制创造上有明显贡献的赋家。由于时代的原因,蒲松龄当然无法跻身于这一行列。从他在辞赋创作上所显示出的创造力和作品所达到的艺术水准来评价,将蒲松龄定位为二流赋家,应当不是溢美之论。

参考文献:

[1] 盛伟.蒲松龄全集[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8.
[2] 路大荒.蒲松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A Textual Research on and Criticism of the Prose and Poetry of Pu Songling

WANG Mao-fu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Zhejiang Province*)

Abstract: This article, through a textual research, attempts to fix the exact number of the prose and poetry written by Pu Songling, along with the year and the background of each piece. It also analyzes the contents of his writings by the type and evaluates their artistic achievement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prose and poetry. Some pieces are comparable artistically with the best pieces of their kinds in literary history, especially in terms of their creativity in theme and subject matters, the diversity of the writing style and the vividness of the language. These combine to place Pu in a position very close to the authors of the best prose and poetry in history.

Key words: Pu Songling; prose and poetry; style; artistic achievement

(责任编辑 郑 园)